



康有为

新

近代改革的先驱者

——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

新

广东省南海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一九九八年六月

南海文史资料

第三十辑

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

——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

作者 钟卓安

广东省南海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一九九八年六月

E499/31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广东省南海市第九届委员会

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名单

主 任：陈仕棠

副主任：冯 植 方钦荣 林小麒

委 员：陈初华 陈树成 黎明晖 陈丽荣

利 军 劳伟锋 张翼飞 邓太铭

刘淑贞 苏 昌

序

正好一百年前，著名的改革先驱康有为，发动了力图改变中国社会行程的戊戌变法运动。这场变法运动虽然被慈禧太后制造的政变所镇压，但它虽败犹荣，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竖起了一块历史丰碑！

康有为，广东南海人，出身于封建士大夫之家，是1840年后的国内国际形势，把他铸造成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改革家。鸦片战争，把中国的封建社会逼上了半殖民地的轨道，从此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侵入，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加深，但是反对外来侵略、捍卫中华民族权益的仁人志士也如同运动场上接力赛运动员一般，一个接着一个、一批接着一批地奋起抗争，从林则徐到孙中山，不胜枚举，康有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员健将。

康有为自幼就有超群的天赋和气质，既酷爱圣贤之学，又反对八股科场，虽然累累赴考，但始终志在济世匡时。“哀物悼世，以经营天下为志”的康有为，苦于救世无门，百感交集，一度如癫似狂。就在康有为身处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是西学打开了他的心扉，产生了新的救国思路。就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来说，封建中国的出路不在延续大清王朝的长辫，而在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改造。康有为在认识到资本主义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时候，即矢志不移地置身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之中，并且很快就成为改革派中的佼佼者！

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最大特点，在于他既比洋务派高出一个层

次，也比同时代的其他改革者深刻和坚定。虽然他无可奈何地撑起“孔圣人”的服装，“托古改制”，但始终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。戊戌变法就是这样的一场打着孔子“改制”旗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。

可惜，主要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，康有为的维新队伍过分狭小，而敌对的封建势力却兵强马壮，两者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，因此指望中国改天换地的戊戌变法运动，不过103天便以失败告终。

戊戌变法失败了，但是它以中国近代第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、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永垂史册。正如梁启超说的“戊戌维新，虽时日极短，现效极少，而实二十世纪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”。正是戊戌变法，揭开了中国二十世纪新时代的序幕。

康有为既是戊戌维新的领袖，也是戊戌思潮的核心人物，是当之无愧的近代先进中国人。他的改革派哲学、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、集中国历代大同思想之大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，都是中国思想史宝库中极为闪光的部分。康有为以自己的奋斗所博取的荣誉和地位，已经理所当然地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。

地灵人杰，南海在历史上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杰出人物，康有为无疑是这些杰出人物中的杰出者。南海人民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，缅怀康有为历史功绩的时候，理应发扬先人光荣，把南海建设成更加璀璨夺目的南国明珠！

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钟卓安教授的《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——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》，是他多年研究康有为的成果。它不但概括了康有为最为光辉的前半生历程，而且给予恰当的评价，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。当我们在戊戌变法一百年后的新形势下纪念康有为的时候，钟卓安教授此书作为《南海文史资料》出版，实属可喜可贺之事。我们感谢

钟卓安教授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南海人民纪念康有为活动的支持。

南海市政协主席 邓文初

1998年5月13日

目 录

一、爱国主义者康有为

- (一) 封建士大夫家世……………(1)
- (二) 向西方学习……………(7)
- (三) 穿着孔子服装的改革论者……………(11)

二、戊戌维新运动

- (一) “公车上书”……………(42)
- (二) 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……………(54)
- (三) 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……………(73)
- (四) 帝国主义与中国维新运动……………(114)
- (五)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教训……………(125)

三、戊戌思潮的健将

- (一) 冲击封建专制文化的戊戌思潮……………(147)
- (二) 康有为的改革哲学……………(164)
- (三) 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……………(176)
- (四) 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《大同书》……………(183)
- (五) 戊戌思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……………(198)

附录:

- (一)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和康有为……………(205)
- (二) 对康有为戊戌政变后策动武装勤王的再评价
……………(225)

后记……………(236)

一、爱国主义者康有为

(一) 封建士大夫家世

康有为(1858—1927)，广东南海市银塘乡(苏村)人，⁽¹⁾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在其38岁(1895年)以前的应试和与朋友往来函札中，皆称“祖诒”，1895年中进士后复用原名“有为”，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，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再号更姓，晚号天游化人。⁽²⁾据说在他出生时，其祖父康赞修在钦州任学正，闻长孙出世，十分高兴，即给他取名为“有钦”。但因路途遥远，邮路不畅，当此家书抵达苏村的时候，其伯祖父康学修已经给他起了“有为”这个名字，康赞修只好面对现实，迁就随之。其实“有为”寓意深远。“有为”者，大有作为之谓也，预兆甚是吉祥。

1858年3月19日(咸丰八年二月五日)出生于银塘乡敦仁里的康有为，祖籍广东南雄珠玑里，从其始祖康建元于南宋时迁银塘起，至康有为已有21世，故康有为在1882年说：“苏村又名银塘，吾五百年世居”。⁽³⁾从可查见的族谱看，自九世祖康惟卿起，至康有为，已连续十三世为士人，是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。其中高祖康文耀(17世)是嘉庆甲子(1804)科举人，官至广西布政使；曾祖康云衢，是官至福建按察使的有名士绅。康有为家族的发达顶峰，在他的祖父辈。虽然他祖父康赞修(名以乾，号述之)弟兄四人皆生涯比较平淡，但康赞修的堂兄弟可发这一

时，颇为得志，其中康懿修（又名国禧，字种芝）曾在家乡举办七县团练，为霸一方，且博学多才，藏书万卷，为康有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，康国器（字友之）因在咸丰年间随左宗棠转战江、浙、闽、粤镇压太平军有功，被清朝提拔为广西巡抚，为康氏家族仕宦之冠。

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，是道光丙午（1846）科举人，一个笃守程朱理学的有名学者和教育家，历任钦州学正、连州训导、广州羊城书院监院等教职。父亲康达初（又名致祥，字植谋，号少农），曾受学于大儒朱九江，后以康国器从军福建，授江西候补知县，但因患喘咳病而受阻于康赞修，未曾上任，并在康有为11岁时去世，年仅38年，因此并未对康有为产生什么实际影响。康有为说：“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”，^{（4）}可信。但康氏家族同时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声及远近的官僚地主。

在康氏家族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，是祖父康赞修。康有为自幼聪明好学，懂事知礼，甚得包括康赞修在内的康家长辈们的喜爱。他5岁就向在家诸长辈学唐诗，并“能诵唐诗数百首，述之（赞修）先生见而喜，先生外祖父省闽（劳以迪）先生钟爱尤笃，期为将来大器矣”。^{（5）}6岁拜番禺简侣琴（凤仪）为师，学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朱熹注《孝经》等书。同年，诸父要他答对联，出“柳成絮”，答“鱼化龙”，很是对仗，令伯父彝仲教谕“亟誉”，谓：“此子非池中物”，以喻不是一般的“鱼”，而是会飞出水面的“龙”，特奖以纸张笔墨。据说7岁就能写文章，且有志于圣贤之学，开口辄称圣人如何，乡人为之赐雅号曰“圣人为”。“康圣人”之说从此始。8岁的时候，正好其祖父康赞修讲学于广府学宫孝第祠，学者百人，康有为杂以其间，接受经学教育，年底更随伯父彝仲始学作文。他“诵读《书经》，奥者每次能二篇，数遍辄能背记，诸长老大誉之”。

正当康有为神童般地进步的时候，1868年初，父亲康达初弃他而逝，使他既悲痛万分，但也获得一个表现才华的机会。他“侍疾弥留，跪聆遗训，谕以立志勉学，教以孝亲，友爱姊弟。追思音容，泪下若糜。当时执丧如成人，里党颇异之”。⁽⁶⁾

父亲死后，康有为便随祖父康赞修在连州官舍生活和学习。

“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、文学条理，始览《纲鉴》⁽⁷⁾而知古今，次观《大清会典》、《东华录》而知掌故，遂读《明史》、《三国志》”。三个月后即能“为诗文，皆成篇。于时神锋开豁，好学敏锐，日昃室闾，执卷倚檐柱，就光而读，夜或申旦，务尽卷帙。先祖闻之，戒令就寝，犹篝灯如豆于帐中，隐而读书焉。频阅邸报，览知朝事，知曾文正（国藩）、骆文忠（秉章）、左文襄（宗棠）之业，而慷慨有远志矣”。⁽⁸⁾看来这时的康有为已经开始领略古今事，并有所感触，希望自己也象曾、骆、左那样，成为一代名人、大清国的栋梁。康有为朦胧的政治抱负，从此开始。

康有为在连州跟从祖父，历时一年有余，学识很有长进，甚至“能指挥人事，与州中诸生接，论文谈事，礼容犹然”。在五月观龙舟比赛时，还赋诗二十韵，州吏目金公称为神童，赠漆砚盘、笔盒数事，州人属目焉”。此事令康有为沾沾自喜，不但常以古圣贤苏东坡等自比，甚且“俯接州中诸生，大有霸视之气”，可谓“童子狂妄”！然而，在时兴八股科举考试的当年，有“援笔辄成”八股文章天赋的康有为，居然对“制艺文”“不好之，不工也”。⁽⁹⁾康有为厌弃八股文的态度，既受到长辈的责备，也为日后的科场坎坷埋下隐患。

1870年夏天，康赞修奉调回广州，康有为也随迁回穗，并受祖父强令，从陈莘先生于广州西门外专习八股文，以求功名。但他无心于此，“日与友遨游，不暇学也”。不久，干脆擅回老

家，跟叔父康达节学习文章。正好堂祖父康国器此时与家乡新筑园林“七桧园”，并“藏书于‘澹如楼’及‘二万卷书楼’中，两楼对峙，中间亭池，花木颇盛，有古桧（即水松一引者）七株，数百年物，幽室曰‘七松轩’，导以飞桥为‘虹福台’。”康有为在此优越环境中“纵观说部、集部”书籍，如饥似渴地求知于其间。可是此时的康有为已经14岁了，虽不愿为八股文，但为时势和家人所迫，必须参加童生试，而“专攻制艺”。可是他由于从内心讨厌八股文，而“名为学文，绝不一作”，使“两年费日力于试事及八股，进学最寡”，考试连续失败，与“秀才”无缘。为此康有为受“诸父极责，大诘之先祖（康赞修）前”。大概到17岁的时候，1874年，康有为才中秀才。（10）

按照当时常规，中秀才后的康有为理应在八股文方面继续深造，以参加乡试，但他却放松了八股文的学习，“于时好为纵横之文，时时作诗，与兄弟、乡先辈倡和，又好摹仿古文，然涉猎群书为多，始见《瀛环志略》、地球图，知万国之故、地球之理”，（11）眼界为之一开。这是康有为对世界知识的第一次理性接触。（12）

1876年，19岁的康有为第一次参加广东乡试，然名落孙山，为此他愤学业之无成，请从其祖父康赞修的好友、在南海九江礼山草堂讲学的广东名儒朱次琦（九江）（13）学习。朱九江不但硕德高行，博极群书，而且三十年来多次拒绝朝廷征召，一心讲学，为此被清政府荐授五品卿。他以程朱为根本，特重气节，力主济人经世。他的教育宗旨和教学内容，可概括为“四行五学”所谓“四行者：敦行孝弟，崇尚名节，变化气质，检摄威仪。五学则经学、史学、掌故之学、性理之学、词章之学也”。朱九江反对无用的高谈阔论、琐碎的考据训诂，不满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，主张以高尚的品德和坚实的学问为现实服务。“每议一事，论一

学，贯穿今古，能举其词，发先圣大道之本，举修己爱人之义，扫去汉宋之门户，而归宗于孔子”。同时十分重视对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学习，以为经史不可偏废，士子必读“九通”。⁽¹⁴⁾康有为在礼山草堂从朱九江学习三年，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，使他“如旅人之得宿，盲者之睹明”，决心洗心革面，一意归依，“以圣贤为必可期，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，以一身必能有立，以天下为必可为。从此谢绝科举之文，士芥富贵之事，超然立于群伦之表，与古贤豪君子为群”。在此三年中，康有为经常“未明即起，夜分乃寝”，遍读宋儒经籍、小学、史学、掌故、词章、廿二史札记、日知录、困学纪闻等等。他说：“日读书以寸记”。于是乎感到“浩然通辟，议论宏起”，使过去所学知识“融释贯串”，认为“杂博之学，皆为有用，于是偶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”。甚至指责韩昌黎的《原道》“亦极肤浅，而浪有大名，千年来文家颉颃，作气势自负，实无有知道者”。指责韩昌黎，实际上也就是批评尊崇韩昌黎的朱次琦。康有为为此被朱九江“笑责其狂”，同学也“渐骇其不逊”。十分高傲，但喜欢思考，并善于思考的康有为，经过三年学习，最后反而讨厌“日埋故纸堆中，汨其灵明”；他“日有新思，思考据家著书满家，如戴东源，究复何用？因弃之，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”。为此，他“忽绝学捐书，闭户谢友朋，静坐养心，同学大怪之。……静坐时，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，大放光明，自以为圣人，则欣喜而笑；忽思苍生困苦，则闷然而哭；忽思有亲不事，何为学，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。同门见歌哭无常，以为狂而有心疾矣”。因此“至冬辞九江先生，决归静坐焉”。⁽¹⁵⁾实际上这是康有为思想与乃师朱九江思想发生矛盾的一种表现。虽然，在朱九江的教育下，康有为的学向为之入门，且崇尚气节，刚劲自励，并在往后亦仿效其法教育后进，但是他并非对老师亦

步亦趋，而是敢于突破：（1）朱九江学行严谨规矩，康有为则肆诞不羁，自命不凡，“决以圣人为可学”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从而“尽弃”帖括俗学；^{（16）}（2）朱九江学问尊崇宋明理学，属正统派，偏于保守，而康有为则很欣赏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的陆王心学，以为它直捷明诚，活泼可用，甚至企图借助于它来求得自我思想解放，反抗现实。康有为与朱九江的这些矛盾，正是他高于老师的表现。

在光绪四年冬辞别朱九江之后，康有为回到故里，并从光绪五年正月起，在西樵山白云洞专学佛道，“养神明，弃渣滓。时，或啸歌为诗文，徘徊散发，枕卧石窟、瀑泉之间，席芳草，临清流，修柯遮云，清泉满听，常夜坐，弥月不睡，恣意游思，天上人间，极苦极乐，皆现身试之。始则诸魔杂沓，续则诸梦皆息，神明超胜，欣然自得”。这时的康有为又由尊崇陆九渊、王守仁的以“发明本心”为宗旨的陆王心学，转入佛学。但是康有为毕竟不是消极悲观的遁世之人，相反，他“哀物悼世”，企图“以经营天下为志”。在白云洞中，他曾注释道家经典《老子》，但“后大恶之，弃去”，不同意老子安于现状、无所作为的主张。康有为终于处在苦闷、徬徨、迷惘的人生十字路口上，半人半鬼地疯癫在西樵山中。可也就在这个时候，1879年，翰林院编修、素以文学盛名京师的番禺人张鼎华（延秋）适游西樵山。两人相遇，虽张鼎华不同意康有为的议论，但仍盛赞其志，对人说：“来西樵但见一土山，惟见一异人”，使粤中知识分子尽知康有为，且为之“震惊”。康有为感激张鼎华的雅量，致书订交，还亲往广州拜访之，受到张鼎华的热情接待，彼此“谈则竟夕申旦”，使康有为“尽知京朝风气，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、道、咸、同三朝掌故，皆得咨访”，受益匪浅。康有为说：“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，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

传”。⁽¹⁷⁾此评恰当。这是康有为思想痛苦的一年，也是他思想转变的一年。正是与张鼎年的交谈议论，使康有为的眼界为之一开，知道京城士人中所酝酿的改革新风，似乎找到了思想归宿。显然，如果说教给康有为做人 and 做学问的基本原则的朱次琦，是康有为学术、道德的教导者，那么张鼎年就是使康有为了了解时政的启蒙老师。

(二) 向西方学习

康有为说，就在他1879年“徘徊”西樵山的时候，即“舍弃”了考据帖括之学，专意养心，“既念民生艰难，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。乃哀物悼世，以经营天下为志”，为此他遍阅古今经世要籍和介绍世界近况的中西图书，“俯读仰思，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”。同年“薄游香港，览西人宫宝之瑰丽，道路之整洁，巡捕之严密，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，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。乃复阅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环志略》等书，购地球图，渐收西学之书，为讲西学之基矣”。⁽¹⁸⁾康有为注目西方，企图从西方学得救国真理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1882年，康有为在参加顺天乡试后回程途经上海时，又见其市容之繁盛，而“益知西人治术有本。舟车行路，大购西书，以归讲求焉”，直到老历十一月才返抵家乡。康有为说，他“自是大讲西学，始尽释故见”，⁽¹⁹⁾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。第二年，康有为更是“购《万国公报》，大攻西学书，声、光、化、电、重学及各国史志、诸人游记皆涉焉”。还准备“辑万国文献通考，并及乐律、韵学、地图学”。为此，他“绝意试事，专精学问，新识深思，妙悟精理，俯读仰思，日新大进”。⁽²⁰⁾把思想的重心从科场应试，转向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。

康有为学习西方的目的，一开始就十分明确，这就是为了改造中国。他有感于中国社会延续千年的“折骨伤筋，害人生理”的妇女缠足的残酷现实，在立志转向西学的1883年，便以超人的勇气，起来破此“固陋已深”的缠足“谬俗”，首先在自己的家里坚决“不为（长女）同薇裹足”。虽然康有为此举使“族人无不骇奇疑笑”，并为他担忧，但他不但不为所动：“吾不顾也”！而且让二女儿“同璧及诸侄女乘势而下”，加入不裹足行列。恰巧，因游美而思想比较开明的南海区村人、员外郎区潯良家“亦不裹足”。康有为为了冲破“独立甚难”的局面，造成移风易俗的不裹足声势，同年即与区潯良商议成立了首开岭南先河的“不裹足会”，并在所拟条例中规定：“凡入会者，皆注姓名、籍贯、家世、年龄、妻妾、子女、已婚、未婚”；“凡入会者，皆不裹足，其已裹足者听，已裹而复放者，同人贺而表彰之”。康有为说，当时入会者“甚多”。^{〔21〕}这是近代中国继厦门“戒缠足会”（1877年）后的又一个“不裹足会”，它们无论在反对贱视妇女的传统观念方面，还是在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史上，都具有开创的性质和积极的意义。

此后，康有为对西学常学不辍，时有进步，并结合他对古籍的了解，加以发挥，心得日多，拯救众生的思想益坚。如当他知道显微镜“视虱如轮，见蚁如象，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”，知光电速度每秒数十万里，“而悟久速齐同之理”，从而“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，至小之内尚有小者，剖一而无尽，吹万而不同，根元气之混仑；推太平之世，既知无来去，则专以现在为总持；既知无无，则专以生有为存存；既知气、精神无生死，则专以示现为解脱；既知无精粗、无净秽，则专以悟觉为受用；既以畔援散荡皆尽绝，则专以仁慈为施用”。康有为认为，世界万物都“以元为体，以阴阳为用”，其性质表现为冷热、拒吸、凝流、方圆、白

黑、清浊、雌雄、魂魄八个方面的对立统一；世界包括天、星、地、身、魂、血轮各个方面。断言地球各国和各种族、宗教，终归是要统一的，并且在统一之后仍将继续演进，但是究竟“及五百年后如何？千年后如何？世界如何？人魂人体迁变如何？月与诸星交通如何？诸星、诸天、气质、物质、文明、政教、礼乐、文章、宫室、饮食如何？诸天顺轨变度、出入生死如何”？所有这些，对于他来说都是“奥远宵冥，不可思议，想入非非，不得而穷”的，既无法知道，也无法想象。他认为，既然世间万物无所谓大小长短、有定无定，而都是在不断变化；也无所谓毁誉、丧得、始终，而是“汗漫无为”，“悠然以游于世”；不管是富贵贫贱、安乐患难、帝王将相、乞丐饿殍、牛马鸡豕，都终归一死，“无所希望，无所逃避”，那么他生来入世间就不应该不是为了争富贵、求安乐、称帝王，而必须是“专为救众生而已。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，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，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，不肯自洁，不肯独乐，不愿自尊，而与众生亲。……故日日以救世为心，刻刻以救世为事，舍生命而为之，日号于众”⁽²²⁾。康有为的这些学习西方科学的心得，颇含辩证思想和为民解难的人生观，对他以后走上救国救民的资产阶级改革道路，具有奠基性的重要意义。

1885年春天，康有为突然“头痛大作，几死。日读医书，既而自痛不能视文字，医者束手无法，惟裹头行吟于室，数月不出，检视书记遗稿，从容待死”。就在此时，他“以信西学之故”，研读西医书，并亲自“创制西药，如方为之，乃渐效，日走村后大树下，至七月乃瘳”。⁽²³⁾康有为对西学的追求本来就十分真诚，现在因治病得益而态度更加执着。第二年（1886），他即请好友张鼎华转告两广总督张之洞：“中国西书太少，傅兰雅所译西书，皆兵医不切之学。其政书甚要，西学甚多新理，皆中国所

无，宜开局译之，最为要事”。但张之洞将“皮球”踢回给康有为，要他与文廷式办理此事，结果美梦破灭；转“议以商力为之”，又没有成功。开局译书想法的受挫，使康有为深感遗憾，竟以拒绝张之洞聘他为广州三湖书院学海堂掌教相回敬，然后潜心钻研天象学。根据研究心得，康有为试图“重定天然历法”，以一年为365日，四年设一闰日，一年分“四游”（相当于四季），以春分为一年之始，取消月份，说“何必用十二月焉”。每日分十时，每时为十分，每分为十微，每微为十秒，均取十进制。（24）这是康有为运用西学知识，对中、西、回历进行的大胆改造，虽然未必切当，但是这种学来就用的精神十分可贵。

康有为最为关注的西学知识，在于“中国所无”并“甚多新理”的西方“政书”，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学说。这是康有为的有别于前人和高出于前人的地方。他在1885年大病期间，便“手定大同之制，名曰《人类公理》，以为吾既闻道，既定大同，可以死矣”。（25）把大同之道作为自己至死追求的最高理想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七八月再游香港之后，康有为继续编写《人类公理》，并作《康子内外篇》，“兼涉西学”，结合中国典籍史传，“创地球公议院，合公士以谈合国之公理，养公兵以去不合之国，以为合地球之计”。他说：“其日所覃思大率类是，不可胜数也”。（26）特别是《人类公理》，集中了康有为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智慧，代表了他当年研读西学的最高成就。可惜此书早已失传，我们只能从他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《大同书》中，回索其某些轮廓。

从上述情况看，西学不但有力地吸引了康有为，而且强烈地影响了康有为，使他从一个封建士大夫开始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转变。从西学而得的新思想和观察事物的新方法，使康有为的爱国思想具备了更加坚实的基础。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他既是